

人物小传

银春铭,1935年11月出生在河南省临颖县城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养他先后在临颖县县立中学、许昌第一高中读完初中、高中。因为成绩优异,1955年高中毕业后被选拔为留学生,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1956年9月至1961年6月就读于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现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留学期间攻读了智力落后教育、聋教育、盲教育和言语障碍矫正等4个专业。他和朴永馨一起,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出国攻读特殊教育的两个人,也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仅有的两个出国学习特殊教育的人,特教界称之为“北朴南银”。1961年学成回国后,银先生先后在上海第二聋哑学校、上海市教育局、上海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任职,1997年末退休。银春铭先生在特殊教育领域的一线教学实践、教育理论研究、教育行政管理、特教师资培养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79年春在上海市第二聋校创办的智力落后儿童辅读班,填补了我国特教领域的空白,发挥了星火燎原的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我国大陆地区培智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生端为特教来 唤得春风百花开

——记新中国特殊教育事业拓荒者之一银春铭先生

● 季瑾 孙家文 马建强

一、服从国家需要,留苏学习特殊教育

银春铭的童年时代是在贫困艰难中度过的。他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农民家庭,是家里的长子,另有3个弟弟和3个妹妹。小学时期,时局动荡混乱,学习很是杂乱,既上过民国和日伪的学校,也读过私塾。只是到了1949年春,人民政府开始兴办学校,才有了系统学习的机会。这年春季,完成了六年级下的学业,秋季考入了河南省临颖县当时的最高学府——县立中学。初中三年他一直品学兼优。面临毕业后的选择,他感觉到家中弟妹那么多,父母为一家人的生计太辛苦了,打定主意报考那时实行供给制的技校、职校或中专,以减轻家庭的困难。不想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加速培养人才。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秀,在1952年夏的许昌

地区首次统一中考时,偏偏被分配到远离家乡60里的许昌第一高中。无奈之下,只好靠着每周徒步回家背干粮坚持高中学习;虽然临近京广铁路线,无钱购买4角5分的火车票也是枉然。家里竭尽一切可能支持他的学业,弟妹们为他吃苦都无怨言。在进入高中后,逐步萌生的考大学意愿成了他把高中读完的巨大动力。令他欣慰和喜出望外的是,三年读高中的万里长征(粗算起来步行的路程不会少于15000华里)没有白辛苦,临近毕业时,经过层层严格审查,他被确定为留苏预备生,于1955年9月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接受了一年期的语言、政治思想及物质方面的训练与准备。

当时,出国留学的专业是由国家根据对人才的需

要整体考量、统一安排的。绝大多数留苏预备生的理想都是理工方面的专业,而出乎银春铭意料,分配给他的专业竟是从未听到过的特殊教育。但是,听从国家召唤,服从国家需要,是那时青年人的唯一选择。他也不例外,带着国家的重托和人民的厚望,与另一位去学习特殊教育的朴永馨一起,进入了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由此开启了他们的特教人生。

银春铭先生今年已经82岁了,虽是耄耋之年,但他仍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当笔者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特教人生时,他一字一句、言简意赅地说:我从小玩泥巴块的农村娃娃,成长到年轻时能出国留学,发展到今天对特殊教育还算有些贡献,完全说明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的发展有时候要求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大局的需要,而一旦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往往又会给个人利益的发展创设更大的空间。我从小家境困难,并不愿意上高中,但一旦上了高中,自己就有了上大学深造的打算和可能。如果当时考入其他性质的中等学校,那么后来不但大学上不成,出国留学就更不用想了。安排我出国留学学习特殊教育,当时着实让我大失所望。那时候,理工科非常热门,国家的建设需要最多的也正是这方面的人才,而特殊教育是什么,当时几乎无人知晓。既然是国家的安排,那就接受吧!虽然,学成回国后历尽坎坷、浪费了一些美好时光,但所学的特殊教育终究还是为我个人发挥才华、服务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提起留苏经历,银春铭先生回忆说:刚到苏联时,对特殊教育一无所知,随着专业知识的增加和老师们启发教育,就逐步爱上了特殊教育,树立起了专业思想。意识到回国后的担子可能很重,所以就拼命地学习,尽量多学些。苏联老师也很体谅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我们回国后可能的工作需要,特地为我们两人制订专门的学习计划,把当时苏联仅有的四个特殊教育专业都涵盖进去。我们系里当时没有盲教育专业,就特邀特殊教育研究所的盲教育专家为我们两人上课;后来还破例派我们出差到列宁格勒师范学院的特教系去深入学习盲教育,并进行盲教育实习。虽然,这些专业的内容极为复杂多样,极大加重了学习负担及困难。不过,我们还是战胜了困难,这对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教学实践、学术研究及其他工作大有裨益。真是一



银春铭留苏实习期间,指导聋童学习 供图 银春铭
分耕耘一分收获!

二、不计得失荣辱,矢志献身特殊教育

1961年6月,银春铭和朴永馨一起结束为期5年的留苏学习返回祖国。此时正值赫鲁晓夫撤走了苏联专家,国家极其需要有人接替他们撇下的工作摊子。所以,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很快被分配到了适当的工作岗位;而银春铭和朴永馨二人攻读的特殊教育当时极为冷僻。国家因在“自然灾害”期间实行调整、压缩的方针,竟找不到安排他们两人的适当岗位。他们很理解国家的困难,私下商量:既然学习了这种专业,还是先到基层学校第一线去,把学到的先进理论和国内的实践结合起来,可能对以后的工作更为有利。这种考虑得到了教育部领导的赞许。于是同年10月,银先生带着教育部介绍信来到上海第二聋哑学校报到,开始了聋童的教育工作实践。一位留苏的高材生,竟然做起了小学教员,而且还是聋孩子的老师,有些人把他看成另类 and “傻瓜”。对此银先生本人倒是很坦然:“既然国家花许多宝贵的外汇送我出国学习特殊教育,我就应该用所学知识服务特殊儿童。”令他很不坦然甚至非常纠结的是,那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使他无法专心致志地做好一名聋校教师的工作。

上海第二聋哑学校,当时算是国内最好的聋校之一。该校前身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其子傅步兰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福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被收归国有,改名为上海市第二聋哑学校。学校教师没有受过任何特教专业训练,教学和教育方法相当落后,往往不符合学生的特点和特殊需要。面对这样的局面,银春

◎银春铭和朴永馨教授及全国其他特教工作者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特殊教育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他们为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特殊教育门类较为齐全的特殊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铭先生不躁不懈,力求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一方面通过看课评课等教学研究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些可能的改进意见,另一方面勇敢挑起工作难度最大的一年级班主任担子,将学到的一些理论和技能应用于工作实践,希望能对其他教师起到些示范作用。在聋校的十多年,他先后带过三个一年级班。可惜,随后而来的“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他做班主任的资格。这让他一心教好聋童这一不算奢华的愿望也成泡影,陷入“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的痛苦境地。1971年,学校工宣队硬是把他调离学校,让他随聋校老三届毕业生到上海崇明岛长征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被迫上山下乡做农民,但是看到聋孩子与自己相依为命,他不但没有灰心、没有失望,反而更加坚定了关怀残疾人、造福聋人的生活信念。

1973年,长宁区教育局领导中的一位老干部,了解到上海第二聋哑学校有一名我国少有的特教专家银春铭,竟然被发配农场当农民,感到实在荒诞不经。于是马上由区革委会出面打报告给上海市革委会,才把他要回学校、重返教学岗位。这样,在农场整整做了2年多农民的银先生,终于又回到了他所钟爱、擅长的特殊教育战线。不久,“文革”结束,银先生感觉自己重获新生,憋了十多年的力气以及聪明才智与博爱情怀终于等到了充分发挥的时代,他进入了厚积而薄发的事业黄金期。因而,他对特教工作分外珍惜、格外努力,竭力把自己所有的能力与才华、所有的爱与知识都奉献给祖国的特殊教育事业。1977年,学校恢复了校长制,之后的三年当中,他先后被任命为学校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

1980年春,银春铭先生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的人大代表。1981年上海市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现为上海市教育学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一直到2002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全国特殊教育研究会的筹建活动,并在1982年的南昌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被调入上海市教育局普通教育处负责特教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副处级视导员。1990年初,在银先生的推动下,上海特教师资培训中心挂牌成立,他出任常务副主任,负责该中心日常工作。该中心是一个从事新老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与培训、教学研究、教育科研、信息交流及教育咨询的综合性服



银春铭在上世纪60年代与聋校学生在一起 供图 银春铭
务机构。

三、理论结合实践,毕生贡献特殊教育

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启动,特殊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作为新中国仅有的留苏学习特殊教育的两位专家之一,银春铭先生进入了事业发展的快车道。扎实的国际前沿特教理论功底,完整的本土特教学校实践经历,朴实严谨热爱特教的教学风,让他在重获春天的特教领域中有了用武之地,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和朴永馨教授及全国其他特教工作者一起,共同开启了中国特殊教育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他们为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特殊教育门类较为齐全的特殊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是,大胆创办智障儿童辅读班,填补中国特教在教育门类上的空白,直接推动了我国大陆培智教育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发展进程。

相比国外,我国培智教育起步较晚。银春铭先生在留苏期间,曾主攻智力落后教育,师从苏联著名培智教育专家,并到多所培智辅助学校进行过教育实习,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教学经验。回国后,虽然在聋校任教,但没有放弃对培智教育的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教育事业重回正轨,开始关注学校出现的学生因智力问题而辍学的现象。上海市教育局领导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指示银春铭先生在上海第二聋哑学校里试办这类儿童的教育工作。经过多方面筹备,他筛选测试招收了23名轻度智障学生,编成2个教学班,定名为“智力落后儿童辅读班”,1979年2月正式开学。在辅读班开学的前一年,银先生利用业余和假期

时间,翻译编写了一批智力落后儿童教育的资料,对教师进行扎实的培训,保障了辅读班顺利开张。通过《解放日报》的报道,上海开办培智教育的信息迅速传播开来。许多省市先后到上海参观取经,着手创办培智教育。教育部也不失时机,于1985年春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弱智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从此,培智教育便迅速在各省推广,形成燎原之势。上海市第二聋哑学校辅读班(后发展为上海市长宁区辅读学校)一时间名闻全国。时至今日,全国许多地区仍然把智障儿童的学校命名为辅读学校。特教界把银春铭作为内地开展智障儿童正规教育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称之为我国大陆培智教育的开创者。对此,银春铭先生非常淡定与谦逊,他说:“培智教育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是智力落后儿童及其家庭的需要。我是新中国专门派遣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天时地利人和,我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做了应该做的、也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相比神圣而崇高的特殊教育事业,什么第一个开创,什么名利荣誉,根本不值一提。我常常反思和惋惜的倒是,我国培智教育的起步实在太迟、太迟,我们耽搁的宝贵时光实在太多、太多!需要急起直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是大量翻译、编著、撰写特教教材与理论专著,致力于中国特殊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教育学意义上的近代特殊教育,是从19世纪后期才由外国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起步晚,起点低,规模小,人才少,水平不高。发展特殊教育,首先需要科学化、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自发的、无序的、低层次的摸索。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银春铭先生当年从苏联带回的大批珍贵文献资料、教育专著,终于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从翻译开始,进而到编著,再理论结合实践到原创性专著。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单独翻译、编著和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10多部特教专著,如:《聋人的教学与教育》《缺陷儿童心理》《聋童教育概论》《弱智儿童的心理与教育》《儿童语言障碍及矫正》《听力残疾儿童的语言教学》《智力落后儿童交往能力及培养》《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等,并积极参与了朴永馨教授主编的《特殊教育词典》编纂工作,任智力落后教育单元的主编。他还承担了国家《全日制培智学校劳动技能》(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任务。他共发表

特殊教育论文约70篇,研究方向涉及特殊教育诸多方面,为构建中国特色特殊教育理论体系,做出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奠基性工作。1997年退休后,仍坚持特殊教育研究,致力于翻译资料、著书立说。《儿童语言障碍及矫正》和《智力落后儿童交往能力及培养》就是在2000年之后完成的。

三是积极参与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与培训工作,为各地特殊教育学校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发展特殊教育,师资人才是关键。截至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大陆竟然没有一所培养特教师资的学校或机构,学校师资大多为普通教育转岗而来,其中的部分师资竟然没有任何相关学历。这种“干起来再学”的方法,很难让教师真正承担特殊教育的光荣使命。甚至连上海这样的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特教学校的师资的学历层次也很低、数量很缺乏。而同期,国外的特教师资则是优于普通教育师资,甚至学历上往往也高于普通教育。当年银、朴就读的那个苏联五年制师范学院的特教专业毕业生,基本上都是到小学和幼儿园任教。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师资严重缺乏,成为制约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要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加快特教师资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

1977年后,银春铭先生开始在聋校担任领导职务。乐于助人的他,对本校教师和外校同行,总是无私地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感、所得与他们分享交流。无论是在公开的教研活动中,还是私下的传授经验、个别答疑解惑中,他总是采取诲人不倦、教学相长的态度。1983年之后,银先生作为市教育局的视导员和特教研协会的理事长,常常以双重身份组织特教学校在职教师业务培训、教学经验交流研讨活动,或者亲自到各个学校去督查指导。在市教育局机关工作的8年中,他先后起草过不少红头文件,涵盖了辅读学校教学计划与内容、特教学校的领导体制、特教师资教育、特教学校的名称、特教师资的待遇及聋校毕业生学历认定等重要方面。所有这些,对规范上海地区的特殊教育、提高特教师资的施教能力、提升特教学校的教育工作水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起,全国特教研究会于每年暑期在不同的地方组织在职特教师资的业务培训或经验交流评比。



银春铭在暑期为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班授课 供图 银春铭

银先生作为副理事长,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有一年短短一个月的假期中,他竟然走南闯北,到了三个地方讲课。通常,每个地方讲课都要一连三四天。他主讲的内容有“聋童的心理特点与言语训练”“盲生心理特点与教育”“弱智儿童教育学知识”等。由于他既掌握丰富的特殊教育理论知识,又有一线的教学实践经验和对特殊儿童的正确理解,也熟悉国内外特殊教育发展的概况,所以他的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接地气、务实管用,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回首那段“南征北战”的岁月,老先生感慨地说,那时每逢假期,比平时上班还要忙。一到假期就要离开上海,几年当中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北至大连、哈尔滨,南至广州、昆明,西至兰州、太原,东到福州、青岛。那时坐飞机不够格,火车票也紧缺,往往只能坐火车硬座,最长的一次旅途是从上海到哈尔滨,坐了近40个小时。那时,参加培训班的教师来自各地的特教学校。他们都很热爱特教,意识到自己业务能力较差,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日趋重视,特殊教育师资职前培养的工作进入启动阶段。1982年教育部创办的国内第一所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在南京成立。早在1980年,银春铭先生就与朴教授等一起参与了该校的前期筹备工作,两人共同为南京特师拟订了首份教学计划方案(该方案成为国家教委师范司制订中等特教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基本依据)。从1984年秋开始,南京特师在校舍尚未建成的条件下,先期借用南京盲校的校舍,举办了全国性的聋校和弱智学校在职教师培训班。根据分工,银春铭先生负

责为弱智教师班编写和讲授“弱智教育学基础知识”。1985年南京特师面向全国招收的首届四年制师范生入学后,他又为弱智专业班的师范生主讲了这门专业课程。后来,学校还把这门学科的讲稿印成学生们的教科书。

1986年起,国家教委基教司开始着手弱智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教材等教学文件制订工作。银先生作为弱智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弱智教育的创始人,自始至终参与了该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领导及同行们重视。在教材编写阶段,银先生代表上海承担了《全日制培智学校劳动技能》(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任务。全套分为低年级段、中年级段、高年级段三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的整个基本思路、编写提纲、初稿修改及最后统稿,均由他完成。

1987年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开设了特殊教育专业,培养本科师范生,银春铭先生受聘为兼职副教授,先后主讲过“聋童教育学知识”“儿童语言障碍及矫正”。

2001年,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聘请银春铭先生担任特殊教育专业《智力落后儿童交往能力及培养》的编写工作(该书2002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已经退休了的银先生,还被湖南省长沙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聘请担任该校特殊教育专业课主讲教师。

银春铭先生现居上海安度晚年,他戏称自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享晚年福”。可是他夫人薛师傅却说他是“两耳只闻特教事,一生无悔特教人”。几年前夫妇俩去俄罗斯旅游,在紧凑忙碌的旅游中他关心的还是俄罗斯的特殊教育,抽空去找书店。整个行程没买一件纪念品,却硬是购买了近100美元的特教书籍。这些书成为他退休生活中的主要精神食粮。银春铭先生自信地说:回顾往事,我这一辈子就“嫁给”了我国的特教事业和残疾儿童。虽然这不是自己的最初人生意愿,但终究是无怨无悔。☺

(作者单位: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210036)

(更正:本刊2016年第11期第42页照片说明应为:“与戴目先生合影”。)